

历史春秋



# 百年考古：复原碎片里的千年图景

■ 吴辰

“考古”，既古老又年轻。

就词源来说，考古是一个久已有之的词语，早在宋代，就有吕大临编著《考古图》专门记录收藏于皇家和民间的古代器物。然而，作为学问的考古又十分年轻，在中国，它只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古人眼中的“考古”重的是“古”，他们所关心的是一样器物的年代与价值；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考古所看重的是“考”，他们更关心的是器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背景、社会语境、思想资源。

2021年，中国考古迎来了其百年华诞，对于一个人来说，百年已经是一生，对于一个学科来说，百年已经足够它从幼稚走向成熟，而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来说，百年还太短暂，还有太多的奥秘尚待发掘。但是无论如何，短短百年，中国考古所做出的成绩已经足以炫人眼目。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也从历史的地层中被不断发掘，向世界展示着东方古国的文化底蕴。



兵马俑。（资料图）



曾侯乙墓中的编钟。（资料图）



华光礁1号沉船展。（资料图）



马王堆汉墓一号墓T型帛画右上角太阳中的金乌。（资料图）

## 作为起始的仰韶

中国考古诞生于1921年，那一年，河南西部的一个小山村震惊了全国，村子的名字叫作“仰韶”。

仰韶村以韶山得名，村庄坐落於韶山之下，仰头即可见韶山，故称“仰韶”。而“韶”则是夏商周三代进行重要祭祀庆典时所奏的音乐，孔子在欣赏韶乐后，曾评价称“三月不知肉味”。当地村民一直有传说，称舜帝曾经在这座山上奏韶乐，以礼乐教育黎民百姓。

传说终究归传说，要验证仰韶悠久的历史，还需要实地发掘。1921年，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以及仰韶村所属的渑池县政府的支持下，曾经主持过周口店人类遗址发掘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开始组织一支队伍对仰韶村进

行发掘，而很快，埋藏于地下的大量精美彩陶重新现世，陶器上的人型、鱼型的花纹也仿佛从历史中游进现实，游进了每个中国人的血脉。而仰韶村的这一次考古发掘也成为了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起始，揭开了百年中国考古的序幕。

仰韶文明的发掘之所以能够开启中国考古百年历史，其原因则是在于这是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国人好古，历代文物更是文人雅士案头的必备，也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虽然历朝历代对偷坟掘墓大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然而摸金倒斗之事仍是不绝如缕。中国古代所谓“考古”，其实大多是在破坏古代遗址。而仰韶文明的发掘一开始就旨在保护，而且是经过政府层层

## 百年中国考古的成就

上“看到了中国的古老文明，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曾侯乙墓：在春秋战国，礼乐有着能与律法等量齐观的重要性，这点从成语“礼崩乐坏”中就能窥见一斑，而至于礼乐是什么样的、礼乐的崩坏究竟是如何表现的，人们一直缺乏实物来佐证。1978年，随着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这一切都呈现在了世人面前。曾国作为一个诸侯国，竟使用与周天子同等规制的“九鼎八簋”，这正证明了先秦规制严格的礼乐正在走向解体。曾侯乙墓的发掘不仅挖出了编钟、冰鉴等一批精美铜器，更挖出了礼乐解体初期中国古代社会的风貌。

马王堆汉墓：在长沙近郊的马王堆，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汉墓，这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家族墓。从墓中不仅发掘出了薄如蝉翼的素纱襌衣、五彩斑斓的

## 再现古文明的琼崖考古

光华礁附近发现了一艘沉没的商船，后经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和相关部门的发掘，这艘南宋时期的外贸商船得以重见天日，并被命名为“光华礁1号”。在船上，发现了上万件宋代瓷器，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文物，不仅如此，光华礁1号的发现也向周边国家证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对南海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历史无言，却在昭示着一切。

漆器、象征权利和地位的狄侯之印等文物，还发掘出了利苍夫人辛追的尸体。当这位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老妇人再现人间的时候，考古人员一方面感到兴奋，另一方面则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如何让辛追夫人“永垂不朽”是对中国考古能力的一次重大挑战。而最终，中国还是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考古能力，马王堆辛追夫人和数以千计的文物的成功保存堪称是考古学上的奇迹。

三星堆遗址：要说最近最吸引目光的考古事件，非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莫属，三星堆遗址从1930年代开始发掘，一直到最近，仍然有太多的谜未解。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奢华的黄金面具、巨大的立人铜像和神树、令人费解的纵目人像，都在向人们展示着那个“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的神秘与辉煌。

而在最近由一群著名作家到海南实地探访写作的《海南日记》活动中，许多作家都对万宁神州半岛到陵水一带的沙丘遗址充满了兴趣。沙丘遗址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遗迹，展示了人类移民的步伐，而中华文明则在这些古人们不断前行的步伐中得到赓续。

“家书”自然指亲人之间互报平安的信件。一封信，何以能值“万金”？有文学夸张的成分，更因为战争，驿路不畅，信送不出去，也送不过来，眼巴巴、望眼欲穿，听不到亲人的消息，心急如焚。

其实，即便没有战争，百姓之间的书信往来也走不了官方“快递渠道”。邮驿属于官方机构，传递官府文书、军事情报，民间书信，搭不上车。

杜牧有一首《旅宿》诗，“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一封家书，寄到旅馆时，已是一年之后的事情。纵然家里出了天大的事情，游子也只能望“信”兴叹。古代交通之不便可窥一斑。

民间物流，可走的“路”不多。若有，也许就是从电影电视中经常看到的“镖局”。但镖局押送的都非一般货物，与百姓日常关系不大。

其实，我国邮政业务历史悠久，《秦邮律》便是我国最早的邮驿法规。而在此之前，上推至商周，官方也有传递信息的组织。传递的形式有两种：乘车和骑马。但乘车送信慢，快马加鞭快，逐渐，“马递”代替“车递”。而在水系发达之地，则靠“船递”。

无论何时，道路状况好坏，是物流能否畅达的关键。周朝时，道路的规模和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小雅·大东》记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指通往周京城的道路如磨石一样坚硬平坦。但此“周道”是“周的军用公路，禁止小民行走”。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中国真正的国际长途物流运输之路，最早应为汉武帝派遣张骞走出的古丝绸之路。这条路联通中国、印度、希腊三大文明，长达数千公里。借助此路，汉朝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使者、商人纷至沓来，让中国的丝绸制品、西域的奇珍异宝实现互通，进出两旺。

正是物流，促成了司马迁笔下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是物流，让如今的人们足不出户，“坐享其成”。

流者，活也。

（据《光明日报》）

鸣鹤之应



## 徐志摩对沈从文的宽容

■ 江舟

1922年夏末，20岁的沈从文孑然一身，怀揣着自己的文学梦想，从湖南来到北京城。那时候，年轻的沈从文对北京充满了美好的梦想：寻找理想，读大学，读好书，救国。然而，现实却是无情和残酷的，偌大一个北京城，哪里能够容得下这个从地方部队退役的穷困乡下小子？茫茫人海，举目无亲，沈从文无法进入大学，只好住在西西会馆里，每日到宣武门内的京师图书馆去读书自学。接着，他又搬到沙滩红楼附近的一所小公寓里，去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为了生存，他开始写作，却连新式标点都不会用，但他坚持不懈地写稿，把稿件投向北京的各家杂志和报纸的文学副刊，而这些稿件却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沈从文陷入了穷困和茫然之中。

在生存的困境之中，沈从文写信给北京大学讲师郁达夫，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和不幸。郁达夫非常同情沈从文的遭遇，便在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正是因为这封公开信，沈从文的名字开始慢慢引起了一些报纸杂志的关注，他的一些散文和诗作开始在《晨报副刊》等一些报纸杂志上崭露头角。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主编，负责讲演、译述论著、文艺、诗歌、杂纂等类稿件。上任伊始，徐志摩就在刊首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的文章，表示了办好《晨报副刊》的主张和信心。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列举了可以作为《晨报副刊》基本作者的一长串名单，其中在提到“新近的作者”时，沈从文便已经赫然名列榜首，徐志摩对沈从文的推崇之情，自不待言，这时候，年轻的沈从文和徐志摩已经开始了有最初的接触。

有一次，沈从文拿了一迭稿子送给徐志摩，徐志摩把这一迭诗文稿件翻了一翻，问沈从文有没有发表过，沈从文回答说：“全都是没发表过的”。徐志摩便把这一迭稿子全都留下。于是，在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开始的一个月中，沈从文就在这份副刊上发表了五篇作品。

1925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写于这一年3月的一篇散文《市集》。这是一篇乡村集市的素描，人声喧嚷，猪羊嘶叫，汇成了一支生活的交响曲。沈从文已经能够娴熟自如地驾驭着自己的笔，写出一幅有声有色的生活场景，使都市中的人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乡村生活的浓郁气息。徐志摩是在前任编辑留下的一堆废稿中清理出这篇稿子的。他十分欣赏这篇散文，在编完之后，情不自禁地在文末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的编后感，盛赞沈从文的这篇文章，热情洋溢的话语，包含着赞扬与鼓励，也包含着对一个文学新人的期待。

不过，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沈从文在欣喜之余，却又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因为这篇稿子先送到《晨报副刊》，因为编辑未采用，后来被焦菊隐拿到他主编的《燕大周刊》上发表出来，接着又被胡也频转载到《京报·民众文艺》上，这时在《晨报副刊》上再发表出来，变成了第三次发表了。看到徐志摩所写的“欣赏”，沈从文一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觉得一篇稿件多次发表，这“不是丑事总也成了可笑的事”。他赶紧给徐志摩写了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相，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粗心，也表示了对徐志摩所给的褒扬的感谢。

在那个年代，报刊对一篇多投也是非常忌讳的。但是，徐志摩对这件事却报以极度的宽容，他不仅没有责怪沈从文，而且全文照登了沈从文的《声明》，并加了一段十分俏皮的附言：“从文，不得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遍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其中洋溢着对青年作者的宽容、爱护之情，读来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沈从文个性的真实与坦诚，徐志摩提携后学的宽容与爱护，描绘了一代文人相交的一幅温暖的画卷。1936年5月，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序言中，提到在文学道路上给了他种种帮助和鼓励的一些“特别值得记忆”的人，其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徐志摩。沈从文深情地说了一段话：“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你们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表达了沈从文对徐志摩的尊敬和感激之情，也包含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大师之间的一段感人的友情佳话。

文史荟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 《桐阴清梦图》

笔砚清玩



《桐阴清梦图》是明代画家唐寅创作的一幅纸本水墨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图用白描手法画一长者闭目仰坐躺椅上，在梧桐树下乘凉养神的情景。画面布局疏朗，构图简洁，笔墨干净洗练，是唐寅白描人物画佳作。本幅行书自题七绝诗一首：“十里桐阴覆紫苔，先生闲适醉眠来；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槐。”唐寅画。

该画右边的桐树，虽仅画出树干的底部和右上角桐叶繁茂的几个树枝，让人想出这株桐树老干道劲弯曲，顽强地向外自然伸展，枝叶交错繁密，桐阴如盖。树荫下坡石处一人躺坐于交椅上，仰面朝天，似闭目小憩，神态自然，悠闲恬淡。此图是唐寅在科场案之后透露出画家看破世事，绝意功名后，幽居林下，心情闲适却又夹杂着无所事事的淡淡苦闷。该画具有浓厚的主观抒情意味，可以看作是画家一生放浪形骸、风流倜傥的写照。

明清之际，文人阶层的兴起使得人物画的面貌更加丰富，当时的文人雅士或吹箫抚琴、品砚赏石，或登高远游、听泉观溪，从画中可以领略到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审美品位。将简约纯粹的人物形象与符合自身性格、身份的景象呼应融合，使明清人物画中呈现出了一种独有的“情与境”。

（杨道 辑）